

直到北宋時期，二者之間的關聯才逐漸受到關注，其繪畫開始被賦予喚起詩意的媒介功能，並最終成為蘇軾「畫中有詩」論斷得以誕生的土壤。

第三部分關注《輞川集》作為詩歌、繪畫與園林三者融合典範的正典化歷程。其中第七章旨在考察唐代宗對王維「天下文宗」之評價的背景與影響。透過對比王縉進呈奏章與唐代宗答敕的內容，著者指出王縉奏章多記敘王維的品格日常及佛教修養；相反，唐代宗的答敕幾乎通篇談論王維詩文成就。著者認為，唐代宗的盛讚不僅源於其對王維文學的個人嗜好，同時也出於鞏固唐朝文化權威的政治考量，即在安史之亂後試圖以王維為典範重振中央文壇。唐代宗的評價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形塑了後世對王維的整體印象，亦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唐代對《輞川集》本身的討論。第八章遂轉而考察唐宋之際《輞川集》及相關繪畫〈輞川圖〉的接受史，指出北宋前中期文人往往因眼前的園林景致而聯想到〈輞川

圖〉，繼而在詩中予以表現；而蘇軾及其門人則更常透過觀賞〈輞川圖〉而生發對《輞川集》的聯想，形成詩畫互證的詮釋方式。《輞川集》在北宋後期重新受到重視，其思想根源之一在於當時「詩畫一體」藝術理念的逐漸形成，而王維於輞川莊創作的《輞川集》與〈輞川圖〉遂被視為此種理念的歷史典範。進入南宋後，《輞川集》更進一步被視作描寫文人園林理想生活的典範，最終凝定為王維的「代表作」。第九、十、十一章則延伸追索王維《輞川集》在元明清的接受情況，著者以劉辰翁的評語為線索，揭示元代出現的一種從王維詩作中發掘禪意的新的鑒賞方式，並指出這在明代顧其經《類箋王右丞詩集》、清代趙殿成《王右丞集箋注》中都獲得了一定的繼承，與前述「詩畫一體」的理解方式共同構成了近世中國對王維《輞川集》的闡釋圖景。（岑天翔，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、國學研究院講師）

## 高楠順次郎：世界に挑んだ仏教学者

碧海寿広

東京：吉川弘文館，2024

208 頁，ISBN 978-464-208-450-5

近代日本佛教學者高楠順次郎（1866-1945），被視為以東京帝國大學為中心，奠定歐美式近代佛教學基礎的代表性人物，其一生始終與世界史中佛教的動態變化同步，並活躍於國際學界。本書關注的核心問題在於：他如何重新詮釋傳統佛教，突破日本既有研究框架，並與全球佛學研究展開對話？然而，過去除了 1957 年鷹谷俊之所著《高楠順次郎先生傳》之外，長期以來

缺乏一部能夠全面掌握其生平與思想，以及歷史角色的研究，使其重要性在近代佛教學界，仍未被充分定位。



碧海壽廣正是在此學術缺口與問題意識下，透過跨國史與知識史的視角，重新檢視高楠順次郎如何藉由學術、教育，以及文化實踐，重構佛教知識的國際地位。隨著二十一世紀以來跨國佛教研究的興起，以及武藏野大學百週年相關史料的整理推進，本書得以在新資料與新研究趨勢的基礎上，重新描繪高楠順次郎的學術貢獻，完成一部兼具學術深度與整體視野的評傳。

第一章「改革中的學生群體」，聚焦高楠順次郎青年時期的思想啟蒙與改革活動。高楠生於淨土真宗信仰深厚的家庭，自幼接受漢學經典教育，明治維新廢佛毀釋思潮高漲之際，透過國學研究重新思考佛教的歷史定位，並進入西本願寺普通教校就學；該校兼重佛教研究、英語教育與國際視野的培養，使其宗教信仰與學術志向得以在近代教育體制中整合。其在校期間，作為「反省會」的核心人物，高楠主導創辦《反省會雜誌》，以宗教倫理與人格修養的論述，推展青年思想運動。

第二章「走向世界的日本人」，著眼高楠順次郎的西洋留學經驗與國策性調查，置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歷史脈絡中，指出他並非單純的知識接受者，而是在國際交流與知識流動過程中，逐步形成自身立場，展現作為「世界中的日本人」之特殊角色。這一跨國視角，使本書不同於以往僅關注日本佛教學界的研究，而是具有全球學術脈絡的意義。高楠在牛津大學留學期間，於繆勒（Friedrich Max Müller, 1823-1900）門下從事研究長達七年，期間亦於德國、法國等地的大學修習，除完成《觀無量壽經》與義淨（635-713）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的英文翻譯外，亦撰寫並發表多部英文著作。

第三章「作為學術的佛教」，作者透過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的編纂過程，揭示高楠順次郎如何將佛教重新定位為近代學術對象。其致力於文獻整理與體系化，使佛教知識成為國際學界可利用的資源，並提出「回歸釋尊」的思想取向。同時，高楠將學術研究與人格陶冶結合，展現理想人格在佛教學術實踐中的重要性，形成兼具學術性、公共性與實踐性的佛教詮釋模式。其中最偉

大的成果，無疑是《大正新脩大藏經》，這是一套編輯龐大漢譯佛典，使世界各地學者能便利參照的宏大叢書。高楠身為此出版事業的領導者，在背負債務這一現實負擔的壓力下仍竭盡全力，最終促使該事業獲得成功。

第四章「教育事業與藝術活動」，探討高楠順次郎在學校創建、女性教育推廣及佛教藝術化等方面的具體作為，顯示其思想如何落實於社會，並透過藝術與美感拓展佛教表達的可能性。教育實踐同樣是高楠傾注一生心力的重要事業。除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外，他亦曾任東京外國語學校，以及東洋大學校長，對近代日本知識基礎的建立作出貢獻。此外，他還創辦中央商業學校，即後來的中央學院大學；並創立以佛教精神為基礎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武藏野女子學院，即後來的武藏野大學，培育支撐日本社會的男女人才。

第五章「新文化的創造」，聚焦其晚年活動，分析高楠如何在世界秩序動盪與日本戰敗的歷史條件下提出「新文化」構想，試圖在東洋擴張與現實挫敗之間，為佛教尋找新的歷史定位。高楠的學術與教育活動在很大程度上，建立於其豐富的國際經驗上。無論是長期留學歐洲與南亞佛典調查，乃至於夏威夷授課等經歷，都使其能在跨國知識流動中，形成獨特的研究立場。這些經驗最終匯聚成融合東西方思想的「新文化」構想，對今日跨國佛教研究及全球視野下的人文思想，仍具有啟發意義。

作者最終指出，高楠以「無常」作為思想資源，回應個人生命與時代崩解的雙重課題，認為即使理想非永恆，只要以所肩負的理想為支柱並持續實踐，便能在生命中貫徹「無常的理想」，從而體悟永不改變的真理。

總體而言，本書以扎實史料為基礎，結合跨國視角與知識史分析，呈現高楠順次郎在佛教、教育與出版等領域的多重貢獻，並展現近代日本知識分子，面對世界變動的開放性與調適力。因而，本書不僅是一部評傳，亦是理解近代日本佛教知識史與教育史，以及跨國思想史的著作。（倪管婷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）